

柳宗元诗文选注



柳宗元诗文选注

大连红旗造船厂 大连钢厂 辽宁师范学院
柳宗元诗文选注释组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沈阳

柳宗元诗文选注

大连红旗造船厂 大连钢厂 辽宁师范学院

柳宗元诗文选注释组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10 $\frac{1}{2}$

字数：240,000 印数：20,001—70,000

1974年12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2版 1975年5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2090·31 定价：0.70元

出 版 说 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继续搞好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我们根据先注主要法家的主要著作的精神，出版了这本《柳宗元诗文选注》。这项注释任务，分别由大连红旗造船厂、大连钢厂、辽宁师范学院联合注释组，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辽阳、朝阳、铁岭、盘锦、昭乌达等市、地、盟和锦铁以及省直机关等各注释组承担。

《柳宗元诗文选注》以联合注释组的注释本为基础，同时吸取了全省各注释组的研究和注释成果。

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释出版法家著作，是前人从未做过的工作。承担这项任务的各级党委，都把做好这一工作当作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参加注释工作的工人、贫下中农、驻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专业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力求正确贯彻注释法家著作的方针，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研究不够，经验不足，时间仓促，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需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伟大教导，编写了这本《柳宗元诗文选注》。

柳宗元，字子厚，是唐代杰出的法家、唯物主义思想家和著名的文学家。生于公元七七三年，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五年后中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正字，整理国家图书典籍，以后又担任过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等职。公元八〇五年，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升任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十年后远调为柳州刺史。公元八一九年，病死于柳州，时年四十七岁。因他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县）〔注〕，又做过柳州刺史，所以人们也称他为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宗元成为中唐时期杰出的法家，是同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和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紧密相联的。恩格斯曾经指

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因此，我们必须从柳宗元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关系中考察他的法家思想和路线形成的原因。

柳宗元的一生是在唐封建王朝已经由兴盛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中度过的。公元七五五年，发生了地方分裂势力反叛唐王朝中央政权的“安史之乱”。这次长达八年之久的大规模叛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削弱了中央集权，使唐王朝由“盛唐”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世家豪族疯狂地兼并土地，“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宣公集》卷二二）失地农民纷纷沦为佃户，“终年服劳，无日休息”。

（同上）自耕农大量减少，他们担负各种苛捐重役，被逼得“人穷无告，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旧唐书·李实传》）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象。同时，宦官集团控制了包括废立皇帝在内的朝廷军政大权，地方藩镇则大搞父传子的世袭制和独立王国，形成了一股以豪族地主为阶级基础的反动势力。他们串通一气，反叛中央，你争我夺，互相混战，进一步把劳动人民推进了“非死而徙”的水深火热之

中。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就在柳宗元出生前十一年，袁晁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爆发了，“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起义军迅速发展 到二十万人，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山南、剑南、关中、江淮等地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农民的反抗斗争不仅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的反动统治和为之效劳的孔孟之道，而且促进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影响和推动了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在豪族地主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地位比较低下的庶族地主时刻面临着被吞噬的威胁；宦官和藩镇把持政权和连年混战，也使庶族地主受到排斥和危害，社会地位极不稳定。同时，豪族地主的倒行逆施，促成了日益高涨的农民反抗斗争，动摇着唐王朝的封建统治，使一些庶族地主感觉到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封建制度，要求铲除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因而提出了革新进步、集权统一的法家路线。而豪族地主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则拚命反对社会变革，死抱住孔孟之道不放，顽固地坚持复古倒退的儒家

路线。这样，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同保守派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柳宗元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投身于这场斗争的。他的一生，是为坚持法家路线而战斗的一生。他是“永贞革新”的骨干，同儒家进行大论战的主将。

公元八〇五年(永贞元年)正月，唐顺宗李诵即位，革新派王叔文、王伾执政。柳宗元和刘禹锡等是革新集团的主要成员。当时的革新政令，都经“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新唐书·刘贞亮传》）他们罢黜了京兆尹李实等罪恶昭著的贪官污吏，起用被反动势力排斥的进步人物；加强盐税管理，取消附加税，减免民间欠税五十余万贯；取缔劫掠民财的“官市”和“五坊小儿”，放还部分宫女。他们还派遣范希朝和韩泰去接管宦官的兵权，但是遭到抗拒和破坏。这些革新措施打击了藩镇和宦官势力，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统一，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以宦官俱文珍、军阀韦皋为头子的保守势力疯狂反扑，逼迫顺宗退位，大搞反夺权，制造了“二王八司马事件”，杀害了王叔文，逼死了王伾，把柳宗元等八人统统贬为边远地区的州司马。革新运动不到半年就被扼杀了。

反动势力的打击迫害，并没有使柳宗元屈服。相反，由于长期贬谪在地方，他直接接触到黑暗统治给社

会造成的灾难，对反动势力更加憎恨，对革新事业始终不渝，坚定地表示：“虽万受摈弃”，也决“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他把自己和革新派比作山鹰，自豪地回忆当年执政时同保守派的斗争，渴望破笼展翅，“拔去万累云间翔”，（《笼鹰词》）继续实践他们的革新理想。在任柳州刺史时，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坚持实行了一些革新措施：开凿水井，种植树木，兴办学校，修筑道路，革除了在当地流行的人身典当制度。更重要的是，在他“罪列刑簿”被贬边远地区时，还著书立说，坚持宣传法家路线，继续同保守势力进行斗争。他的著作内容广博，形式多样，除了以著名的《封建论》为代表的许多篇政论文章和《天说》、《天对》、《非〈国语〉》等哲学论著外，还有书序、表志、记传、寓言小品以及诗歌等体裁的作品，在他死后由刘禹锡编为《柳河东集》。这些诗文作品，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情况，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尊法反儒的立场，贯串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进步历史观的思想。

柳宗元的法家路线同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路线的斗争表现在政治、思想和文学等各个领域。

在政治上，柳宗元主张集权统一、革新前进，反对儒家鼓吹的分裂割据、复古倒退。

集权统一还是分裂割据，这是秦汉以来儒法两条路

线斗争的重要内容。直到唐朝中叶，豪族地主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言人韩愈，还在宣扬分封世袭是夏商周三代的“纲纪”，是万古不变的“先王之道”。他攻击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无分势于诸侯”，（《杂说二》）结果传二世而亡，为分裂倒退制造舆论。柳宗元在他的代表作《封建论》中，全面阐述了主张集权统一的政治思想。他明确地用“势”的概念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认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不是以少数帝王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社会历史的客观形势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封制被郡县制所代替也是“势”所必然。这就批驳了儒家所谓分封制是出于“圣人之意”的唯心主义谬论。这在当时是一种杰出的见解。他热烈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高度评价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认为秦王朝灭亡“非郡邑之制失也”，有力地痛斥了韩愈之流借骂秦始皇来鼓吹分裂割据的反动谬论。他总结了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而无叛州”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说明了郡县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表达了他维护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他还针对藩镇割据造成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善制兵，谨择守”的方针，坚决主张由中央掌握兵权，征伐藩镇叛乱，狠狠地抨击了那些拥兵割据，搞独立王国的分裂势力。他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他所说

的“理安”，就是实行集权统一，反对分裂割据。这是柳宗元革新路线的核心。

柳宗元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还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反对突厥等奴隶主军事集团对中原地区的掠夺和破坏。在《铁山碎》等诗文中，他歌颂了唐初抗击突厥的胜利，赞扬了抵御侵扰的正义战争；主张增强国力，巩固边防；强调要“岁备亭障，实以精卒”，“选徒练旅”，（《兴州江运记》）实行屯田。这些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柳宗元认为，要巩固封建国家的集权统一，必须废除世袭制，采取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他反对藩镇势力大搞“父死子继”，坚决主张由中央任免官吏，做到“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封建论》）他总结宦官专权、祸国殃民的历史教训，竭力反对宦官参与朝政、操纵生杀任免的大权。韩愈之流继承了孔丘的“上智下愚”的反动说教，鼓吹“性三品”说，为豪族地主“继世而理”的世袭制进行辩护；诬蔑王叔文革新集团执政是“小人乘时偷国柄”。（《永贞行》）柳宗元则针锋相对，予以严厉驳斥。他在《六逆论》等著作中，明确指出“贵不足尚”、“亲不足与”、“旧不足恃”，贱者、远者、新者只要有才能，就完全应该取代那些无能的贵者、亲者和旧者，强调要重用象吴起、范雎、李斯那样的法家人

物，而对那些昏庸无能、冒居禄位的世家贵族则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热切地表达了庶族地主参政的要求，为革新派重新上台制造舆论。

重农思想是柳宗元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韩愈代表着极端仇视和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的豪族地主的利益，杀气腾腾地叫嚷“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柳宗元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为了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则提出“利于人，备于事”（《时令论》）“厚人之生”（《骂尸虫文》）的思想。他提倡劝农耕、修水利，“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殫其财”，（《非〈国语〉·不藉》）以达到“师有余粮”、“库有利兵”、“家有积仓”。（《兴州江运记》）他针对豪族地主的任意兼并、横征暴敛，提出了“均赋”（《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主张。这些在客观上都有利于发展生产，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思想上，柳宗元坚持朴素唯物主义和进步的历史观，反对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论。

列宁说：哲学“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柳宗元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唯心主义天命论的斗争，是当时儒法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韩愈以孔孟“道统”的

继承人自居，大肆鼓吹“天”是有意志的，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赏功罚祸的能力。他恶毒攻击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活动是毁坏元气阴阳，是“天地之仇”，而残害人民则是“有功于天地”，（转引自柳宗元《天说》）极力为反动势力残酷掠夺和疯狂屠杀劳动人民作辩护。柳宗元继承了荀况、王充的唯物主义传统，坚持了“天人相分”的思想，对韩愈所鼓吹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天地宇宙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元气”分为阴阳两个方面相互作用，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元气”自己的运动；指明自然界的“天”和人“其事各行不相预”，（《答刘禹锡〈天论〉书》）“天”没有意志，不是人类社会的主宰，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所以，“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非〈国语〉·料民》）以为天能赏功罚祸，以至向天呼怨乞怜，都是荒谬的。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柳宗元力图从人类社会本身来寻找历史发展的原因，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由天命决定的，统治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贞符》）严厉抨击了儒家所鼓吹的“君权神授”说。他指出自从董仲舒以来，把自

然界的某些现象说成是统治者受命于“天”的符瑞，都是骗人的鬼话。他援引王莽、公孙述利用符瑞搞篡权、搞割据的历史事实，揭穿了儒家鼓吹天命论和野心家、阴谋家的倒行逆施之间的联系，给当时的宦官、藩镇等反动势力当头一棒。他还在《非〈国语〉》里对以卜筮、祈祷、星象、童谣以及人的相貌举止等来预言生死祸福的迷信邪说逐个进行了批判。柳宗元力图说明天命论和有神论的社会根源，揭露儒家宣扬天命鬼神的罪恶目的。他说：“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断刑论下》）“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非〈国语〉·神降于莘》）这就戳穿了历代统治者宣扬天命鬼神借以愚弄劳动人民的鬼蜮伎俩，暴露了他们的虚弱本质。柳宗元大声疾呼：“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愈膏肓疾赋》）鼓舞地主阶级革新派要有所作为，不要听天由命，要敢于向保守派进行斗争并取而代之。柳宗元的反天命思想为他的革新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文学上，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主张。

文学历来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柳宗元在“文者以明道”的思想指导下，用文学宣传法家的进步思想，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矛盾、揭露黑暗现

实的散文和诗歌。他的《捕蛇者说》，勾画了一幅中唐农村凋敝破败的悲惨图景。“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正是对那些横征暴敛的反动统治者的揭露和谴责。《田家》诗也叙述了农民的艰辛困苦。他的《三戒》等讽刺性作品，多数都借寓一种事物，诸如老鼠、蠢驴、小虫、毒蛇，以至高价的鞭子，曲腿的小儿，无不以突出的典型，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构思，鄙视憎恶的感情，对豪族地主和孔孟之徒，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乞巧文》中，作者以“大拙”自称，和那些反动贵族、宦官以及趋炎附势者流的“大巧”对比，刻画了巧伪人的种种令人作呕的丑恶嘴脸，表明了自己宁可“贬身绝命”，也要“抱拙终身”的坚定的法家立场。作者也写了一定数量歌颂正面形象的诗文。《南霁云睢阳庙碑》等篇，热情颂扬了反叛乱、反分裂斗争中的有功人物。《童区寄传》赞扬少数民族的一个牧童冲破奴隶枷锁的机智勇敢。《种树郭橐驼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作者还有一些诗文是赞扬革新派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等诗篇和一些文章表达了柳宗元被贬后悲愤的感情和渴望革新的思想。

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柳宗元和韩愈都反对六朝以来盛行的辞藻华丽、缺乏社会内容的骈体文，主张革新

文体和文学语言，但是，他们的指导思想的目的却是背道而驰的。就连宋代反动儒生王应麟也不得不承认，

“韩柳并称，而道不同”。（《困学纪闻》）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就是要使文学为宣扬孔孟之道效劳。柳宗元的文学主张和实践，同韩愈形成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柳宗元在唐朝中期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了先秦以来的法家思想，提出了不少超越前人的精辟见解，在儒法斗争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但是，柳宗元毕竟是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所坚持的法家路线和革新措施，目的仅仅是为了革除当时的弊政，使唐王朝的统治能长治久安。他不可能认识，也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日益尖锐的基本矛盾。他的“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思想，正是地主阶级本性的反映。柳宗元反天命论比较坚决，坚持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但并没有越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藩篱，不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也作了妥协。他尊法反儒，但不彻底，在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些儒家的糟粕。这表现了他在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中，已经不象西汉以前的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那样具有鲜明的革命气息和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尽管如此，柳宗元仍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法家。

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指出：“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毛主席借用这个寓言，说明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最终要被人民战胜，为我们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古为今用”，做出了光辉的典范。当前，研究柳宗元的法家思想和中唐时期的儒法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实的阶级斗争，吸取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益的经验教训。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围绕着革新前进还是复辟倒退、集权统一还是分裂割据的问题，儒法两家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这一斗争在内容和形式上虽然不同了，但它仍然存在，而且更加尖锐深刻。建国以来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代表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都是搞分裂，搞倒退，搞复辟的。毛主席指出：“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